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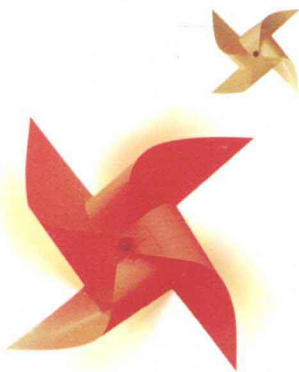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0（精编版）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朱栋霖 主编

■ 半学年的课时容量，适合新闻、文秘、广告、影视等多个专业的教学安排。
■ 『多声部』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创新性的『声音』，满足师生对文学史复杂性的直觉与想象，激发探索热情。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0（精编版）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朱栋霖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0(精编版)/朱栋霖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1

(博雅大学堂·中国语言文学)

ISBN 978 - 7 - 301 - 16779 - 3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史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9768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0(精编版)

著作责任者: 朱栋霖 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6779 - 3/1 · 23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423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出版和使用说明

一、这套教材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含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精编版(全一册)。文学史的叙述时间延伸到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本教材使用对象为中国语言文学各专业方向(含师范教育、文秘、对外汉语专业方向)、新闻传播学各专业方向、戏剧影视学专业等。随着教学改革进行,作为中文系主干课的中国现代文学(含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课时有所压缩,在新闻传播学、广告学、中文文秘、对外汉语、戏剧影视文学各专业方向,该课程的教学时数更短。我们根据各方面要求编著了这部精编版教材。

三、这部教材的一个新特点是,在文学史叙述的各章节增加了“声音”栏目,即在相关的文学史现象、作品评述中,以“声音”形式介绍了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许多观点之间甚至是相互抵牾的,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史的复杂性,我们也借此一并呈现出来。通常所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在对于经典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的历代不断解读、阐释和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层层积淀而形成的,所谓“文学史”就是历代读者(研究者)阐释解读(“接受”)所积淀的、思想与审美的历史。作为本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声音”所提供的学术信息与本教材叙述主干共同形成了文学史叙述的多样性与张力。这一体例不同于历来的文学史著述,是一种新的尝试。由于本教材主要立足于本科教学,注重加强作品研读,因此会有若干重要的文学论争没被采为“声音”,这应是可理解的。

四、我们旨在提供一个贯彻新世纪教学改革理念的新教本,提倡启发式、开放式、探究式的专业课教学,探索建构思考型、探究型、教学互动型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各校教师在教学时,可有机结合各章节的“声音”,并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0》(精编版),通过加强对经典作品的研讨来加深对文学史的理解、把握,培养学生思考探究能力,促进课堂讨论、师生互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加强自学与写作指导,培养创新型人才。

五、与此文学史相配套,我们编选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0》(精编版,全一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0》(精编版)除了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精编版)的学术思路,精选若干经典作品

2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精编版)

外,每篇作品还附有“作家自述”、“名家要评”、“作品解读”、“拓展阅读”四个栏目,极大方便了师生的教学。

六、本教材配有该课程教程的全套多媒体课件,供课堂教学使用。各校教师可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联系(见版权页的电话)。

恳切希望各校同行教师在教学中积累丰富经验,对本教材的进一步修订提出宝贵意见。

朱栋霖

2011年10月18日

出版和使用说明	(1)
---------------	-----

目 录

导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1)
第一节 “人”的观念与文学史构成	(2)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开端	(7)
第三节 文学观念的变革	(9)
第四节 文体叙述的创新	(13)
第一章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确立	(20)
第一节 “人的文学”与白话文学	(20)
第二节 启蒙精神与现代小说确立 鲁迅	(33)
第三节 人生写实与浪漫抒情 郁达夫	(50)
第四节 诗体解放与诗美探寻 郭沫若 徐志摩	(63)
第五节 性灵发现与散文勃兴 周作人	(76)
第六节 话剧的舶来与初创 田汉	(84)
第二章 30年代:新文学重要收获	(91)
第一节 人文主义的深化与左翼的兴起	(91)
第二节 小说流派与群落的竞起 沈从文	(103)
第三节 风格多样的长篇体式 老舍 巴金 茅盾	(118)
第四节 俗雅交融的现代通俗小说 张恨水	(134)
第五节 现代话剧的成熟 曹禺	(141)
第六节 现代诗学的标志 戴望舒 卞之琳	(154)
第七节 犀利、幽默与独语 林语堂	(162)
第三章 40年代:战时背景下的文学嬗变	(172)
第一节 战争状态与文学的区域分化	(172)
第二节 解放区的文学方向与实践 赵树理	(181)
第三节 都市、消费与文学的现代性 张爱玲 钱锺书	(193)
第四节 凝目现实与诗学的综合 艾青 穆旦	(210)
第五节 感应时代的历史剧	(218)

2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精编版)

第四章 50—70 年代:国家体制下的文学状态	(226)
第一节 新的政治空间与文学的规范化	(226)
第二节 革命叙事与探索生活的“边缘”	(237)
第三节 配合现实与话剧民族化探索 《茶馆》	(251)
第四节 政治抒情诗与散文模式	(261)
第五节 另一重文学空间:台湾与香港 白先勇 金庸	(272)
第五章 80—90 年代:当代文学新时期	(282)
第一节 人性复归与多元探索	(282)
第二节 文学反思与先锋实验 贾平凹 莫言	(297)
第三节 众声喧嚣中的长篇收获 陈忠实 余华 王安忆 王小波	(315)
第四节 朦胧诗与诗歌多元化探索	(338)
第五节 戏剧在两岸的探索	(347)
第六节 散文园地的重建	(356)
第六章 新世纪文学	(363)
第一节 传统的延伸	(363)
第二节 “80 后”与青春写作	(371)
第三节 新媒介与文学新型态	(376)
后记	(382)

导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人”的观念 梁启超 “新文体” “诗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言文合一” 黄人 林纾 谴责小说 鸳鸯蝴蝶派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古典形态的中国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嬗变为现代文学形态。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迅速、纷纭的种种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世纪末到1917年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数十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文学现代化发生的先导和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中国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

20世纪初,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年政坛剧烈动荡,文化领域尚未出现革命性变化。但是,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下,中国社会的震荡日益激烈,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启动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遏止。在政治领域,激烈的社会革命取代了温和的维新,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世俗政治权力正在寻求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现代民族国家在强权与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走向独立;在经济领域,沿海的城市在西方世界殖民过程中依靠输入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移植的过程中形成;在社会领域,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新的社会集团与阶层日渐形成;在文化领域,现代进程首先表现为现代文化的生产机制逐步建立,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型知识阶层逐渐形成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型知识阶层利用文学作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工具的功利主义

意识,和以文学为人生的探索、表现,保持文学独立审美价值的纯文学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新异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文学创作在传统基础上酝酿着重大的改良与革新。

第一节 “人”的观念与文学史构成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19—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运动与变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但是,什么是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的更迭、文学流派的纷呈重组?

“人”的发现 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①所谓“人”的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不断发展、嬗变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与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自我如何协调、平衡、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观念的演变史: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来指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共产党宣言》同样指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人类的目标。

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与认识,也决定了文学的发展。

“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 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上古人怀着对自然的恐惧、崇拜与憧憬,形成了原始朴素的“天人合一”观,上古神话、祭祀仪式就反映了上古人对自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憧憬、恐惧与探索。儒家理念以仁为本,“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以人性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关系为主体,形成了以封建宗法观念为基础的传统

^① 朱栋霖:《人的发现与文学史构成》,《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的理性人文主义。老庄主张“无知无欲”，“适性逍遥”，以“虚静恬淡”为道德之至。佛家主张人生本质乃痛苦、解脱、修行，以及“本无”、“无常”、“性空”，禅宗主张“心性本净”，“万法尽在自心中”。有儒家人学观，就有古代千年繁若星汉的言志抒情之作；有老庄“适性逍遥”、“虚静恬淡”论，就有陶渊明、王维、苏轼、马致远等人的清新脱俗；有禅宗“心性”、“禅悟”说，才有以诗谈禅、以禅趣入诗，才有“妙悟”、“顿悟”、“性灵”、“神韵”说。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明代中叶新的社会发展因素涌动，市民阶层诞生，于是有对“人”的新的发现。新的人学观质疑、挑战程朱理学，有“天理人欲之辨”。王阳明创心学，提出“心，即是天理”，“良知是尔家的准则”，“致良知”，回到自己的本心。王艮标立心学左派，“人性之体，即是天性之体”，“身与道原是一体”。李贽独创“童心”说，“人道即是天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萌动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末的中国反叛的个性主义思潮，激发了中、晚明新的文学观念的发展，以及各种新的长篇叙事性文体创作的勃兴。从吴中才子唐伯虎、祝允明的疏狂脱略，徐文长的狂放不羁、为情而作，到公安、竟陵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金圣叹独标“才子书”，力赞《西厢记》为“天地妙文”；从汤显祖尊情抑理的《牡丹亭》、冯梦龙等以“情教”代“礼教”的“三言”、“二拍”，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对人性、人情、人欲、人格的刻画，以及诸多人情、言情、艳情小说的问世，到晚明晚清闲适、人情、香艳小品，乃至沈复《浮生六记》等等，都反映了对“人”的新发现与文学创作中新的“人”的观念的活跃、涌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裂变，梁启超倡“新民”说。所谓“新民”，就是新的“人”的观念。这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呼唤。梁启超的“新民”说剥落了封建君主、宗法家族的囚束，认为人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称为“国民”。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学高扬个人的旗帜，胡适宣传“易卜生个性主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被称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的观念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在这一“人”的理念基础上产生了五四文学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有《狂人日记》对“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有《阿Q正传》对旧“人”的反思，有《沉沦》中人欲的张显，有《女神》青春的放歌，有新月派的人性抒发。

“文学是人学”，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对“人”的发现。各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决定于创作主体从何角度发现“人”、思考“人”。看重人的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

关系的,形成现实主义;着眼于人的心灵情感的,则倾向于浪漫主义;而认定人的心灵真实、潜意识的深刻性的,就走向现代主义。这些都包含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深刻性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尤见如此。

文学史,就是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形象)、接受主体(阅读与批评)的三个层面上,实践与表现着对“人”的不断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文学如何实践与表现这一不断演变着的“人”的观念,而构成着,丰富着,发展着。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人”的发现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与交融。

1928 年的革命文学、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这是继五四发现人的个人性、社会性之后,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观念一贯看重人的社会性,看重社会群体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使受西方个性主义思想影响的五四新文化与“人”的观念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个性主义人学观,五四人学观始终与人的社会性相结合。因此,关注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不幸命运与被压迫地位呼喊,这曾是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一关注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出发,很容易在一部分持激进思想的人士中产生阶级论。在有不同阶层的人存在的社会,人必然有其阶级性。这是左翼文学对人的新发现,也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天地。左翼文

声音

近现代通俗文学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发挥文艺功能上它完全可以与纯文学相互补。……纯文学重探索性、先锋性,重视发展性情感;通俗文学则是满足于平视性,是集体心理在情绪感官上的自娱、自赏与自我宣泄,崇拜人性的基本欲求。(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学进而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定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革命文学中的“人”的观念与话语。当然,三四十年代还有茅盾等许多作家创作的注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有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等人各具特点地承传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有老舍、钱锺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人”的观念。

此外,第三种“人”的观念,是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人”的观念: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综观“文革”前“十七年”文学,是多种“人”的观念、“人”的话语在对抗、冲突、交奏。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影响最大,也是“十七年”文坛唯一的关于“人”的话语。

这一时期连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实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与话语的否定。这时期,乃有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豆》、《小巷深处》,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四种剧本”、戏剧《茶馆》、《关汉卿》等作品,不绝如缕地发出人性的轻微声音。这声音是轻微的,但也是顽强的。即使在《百合花》、《青春之歌》、《三家巷》这些革命小说中,“人”的声音也若隐若现。《青春之歌》中追求个性主义的林道静终于走上革命道路,否定了五四个性主义道路,但是作家以女性的敏感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与婚姻问题上的心灵选择,使这部在实质上重返30年代“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富有人情味与人性美。

在经历了“文革”将文学中的人性赶尽杀绝、以“革命性”、阶级性抹杀人性的描写后,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沿革,这正是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对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再寻找,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20世纪中国文学和外来影响 这种变化又是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分不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最基本的不同,就是3000年的中国古典文学是在大体一统固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发生、发展、繁荣、变化的,而前者是在世界文学潮流中成长、发展的,它自身也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是在前所未有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同时也走向世界的变革中,通过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走出自我迷失,实现自我创新的历史。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展示在中国人面前。自此,中国文化、文学乃至民族心理所发生的巨大裂变,都纠结着外来文化的刺激。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文化不断发现“人”,启发着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来影响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中,从古希腊文学到19世纪文学,众多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具影响的有四位代表性人物。易卜生在五四高潮时期被《新青年》隆重推出。但是戏剧家易卜生在中国主要是被作为启蒙思想家接受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连同他的剧作《玩偶之家》对于夫权家庭的批判、对于妇女平等自由权利的呼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倡扬个性主义的旗帜。卢梭是又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忏悔录》从1928年至1945年间有张竞生、章独、汪丙琨、凌心勃、沈起予、陈新等六种中译本问世。这位启蒙主义思想家袒露自己本来面目的真诚与勇气,激励了许多

中国人。“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卑鄙、邪恶、善良、宽容、高尚,我都如实说出来了。……全能的天主啊!把无数的众生召唤到我身边来吧,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吧。……但愿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怀着同样的真诚,敢于在您的宝座前坦露他的内心,然后再看一看,哪一个敢于对你说:‘我比这个人更好。’”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巴金的小说中都有卢梭式的自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在中国道德裹挟下的人性是暴风雨般的闪击,使伪道学者感受到作假的困难。尼采,曾在一些激进的文化人中产生共鸣。他那攻击一切偶像与张扬超我的精神,吻合了五四彻底反传统的潮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曾在五四小说创作中引起反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茅盾、曹禺、沈从文等人刻画性爱与人物心理都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理论。

这四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对于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从四个层面揭示了“人”的内涵。易卜生以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使个人的自由、自尊、人格、人权显现出耀眼的价值。启蒙主义者卢梭以理性主义思想呈现人性的正负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对人性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揭示,使人的真实自我获得了理性主义的确证。尼采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颂扬了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逆精神。弗洛伊德则揭穿人的深层意识,以及在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了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五四文学就是建构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鲁迅十分敏感地把握到文学的这一内核,他在五四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明确发出“真的人”的呼喊。

中国当代文学的外来影响 无疑地,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体现了这种“人”的观念的寻找、恢复与深入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呼应的,是西方文学的又一次深刻影响。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在新时期短短十多年中几乎都被介绍进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这四位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等思想观念渗透在“文革”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易卜生、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司汤达等人所提倡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已为中国文坛所熟知与普遍接受,而在 20 年代仅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尼采、弗洛伊德,在 80 年代再度进入中国,掀起了一阵广泛而经久的热潮。詹姆斯提出的人的意识流理论,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都展示了人的深层意识的空间,这是人类对自我的一次新发现。以卡夫卡、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文学,揭示了人的生存的荒诞性,这是人类对自我处境、人与社会关系的又一次哲学的探询与发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美学的异彩都是汲取了这些异域的养料,共同体现了对人的发现与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80 年代上半期文学中所谓对“人”的寻找,仅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恢复和再发现,是将被扼制与摧毁了的“人”的观念、“人”的形象进行重塑。80 年代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从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他人即地狱”、“自由选择”,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 90 年代的文学创作中。90 年代中国文学中重要的现象如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先锋文学等,其哲学观念无不深藏着存在主义。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近十年来或许并未产生足以代表这一时代的文学杰作,但是此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新发现,“人”的观念的新发展,却是不容忽视的。

声音

应该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文学”观念。不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眼光,没法把中国现当代文学识透。脱离了世界文学的文化背景,孤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必然是比较文学的。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必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朱栋霖主编:《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开端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开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在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许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在 1898 年前后发生。^①

^① 参见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册,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3 页。

声音

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观和进步的观念。(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甲午战争失败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民族危机感和救亡图存意识日益强化,这对民族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严复的译书将西方19世纪现代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标举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思考民族命运,从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中看到了古老中华民族正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于是有了强烈变革的要求,有了追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想法,有了学习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自觉。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①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基本一致。

近代文化的变革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第一,社会体制对从事文学活动和报刊经营者的基本保障。晚清王朝尽管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在社会压力下还是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法律。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有限自由;1910年公布《著作权章程》;1911年颁布《钦定报律》,同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虽未及公布,但它是民国初年暂行民法典的蓝本^②。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更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并且先后颁布了《出版法》、《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保障和促进了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二,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勃兴。在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在清末十年里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在民国更是大步地前进。从1901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以上;据统计,1902到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含报纸一种),1840到1911年间出版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92年版。

② 民国元年刊行的《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其基本体例和主要条文与《大清民律草案》没有区别”,见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之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小说(含翻译)两千余种,为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外部条件^①。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销售,刺激文学的发展。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褪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②。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文化需求保持着联系,从而决定了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特性。它给以具有现代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公共空间,为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创造着机会。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

第三,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传统读书人抛到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境地,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仕途经济”圈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行列;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在形成的过程中为独立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其中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即是代表。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基础上,文学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朝廷的策论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由对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对阅读的理解。文学接受者的队伍随着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扩大,同时伴随着社会思潮的迅速更新、市场机制的调节,文学接受者也唯新是骛,推动着文学的变更。

第三节 文学观念的变革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曾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创“新文体”,提倡“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他的《新民说》的中心思想是启蒙,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制造中国魂”。这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与人的现代化的呼唤。梁启

① 据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②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4页。

超及其同时代人尤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这样的文学观一直影响到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从创刊号开始,连续四年发表了约11万字的《新民说》。《丛报》封面上,蓝色海洋映衬着红色中国版图,显得尤为鲜明。

“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文言写作的诗文依然为正宗,其地位不可动摇。晚清的文学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①新意境即“理想之深邃阔远”;新语句则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即如他所称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以诗评家身份标榜“诗界革命”,但因其保留诗歌旧形式,还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以俗白文字入诗的是黄遵宪。后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总结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语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小说界革命” 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

①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卷22,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